



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恩 格 斯

# 德 国 农 民 战 争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二 年 · 北 京

F. Engels

DER DEUTSCHE BAUERKRIEG

本书正文是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所載譯文排印的，原譯文是由熊偉據德文本譯出，洪理校訂。其余各篇譯文的出处和譯、校者，均在文末注明。

恩 格 斯

德 国 农 民 战 争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6 · 插页 4 · 字数 136,000

1962年9月第1版

196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400 定价（六）0.90元

统一书号 1001·540

## 目 录

序 言.....	1
德国农民战争 .....	17
一.....	17
二.....	30
三.....	51
四.....	66
五.....	71
六.....	97
七.....	107

## 附 录

一 恩格斯：馬克.....	117
二 恩格斯：[論普魯士农民的历史].....	136
三 馬克思恩格斯书信(摘录).....	148
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1856年4月16日).....	148
馬克思給拉薩尔的信(1859年4月19日).....	148
恩格斯給拉薩尔的信(1859年5月18日).....	151
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1882年12月15日).....	154
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1882年12月16日).....	155
恩格斯給梅林的信(1893年7月14日).....	158

恩格斯給考茨基的信(1895年5月21日) .....	159
<b>四 恩格斯手稿</b> .....	161
[論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产阶级的兴起] .....	161
关于《农民战争》 .....	172
关于德国的札記 .....	173
《关于德国的札記》第二篇手稿(摘录) .....	180
<b>注 釋</b> .....	182

### 插 图

德国农民战争图

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农民战争图(1525年)

## 序 言<sup>①</sup>

这部著作是我于 1850 年夏天,即当刚刚结束的反革命还留着直接印象的时候在伦敦写成的,登载于 1850 年在汉堡由卡·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报. 政治經濟評論》杂志第 5 期和第 6 期上。我那些在德国的政治友人請求我把它刊行再版,于是我便来满足他們的願望,因为可惜它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意义。

这部著作并不希图提供出独立研討过的材料。相反,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馬斯·閔采尔的全部材料,都是从齐美尔曼那里借用的。他那本书虽然有些缺点,但终究是最好的事实材料汇集。并且,齐美尔曼老人对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寄予了很深的感情。驅使他在这本书里到处都作为被压迫階級的拥护者讲话的那种革命本能,不久后就使他成了法兰克福那里极左派的最优秀代表之一。誠然,从那时起,他仿佛是有点落后于时代了。

如果說在齐美尔曼所作的論述中缺乏內在的联系;如果說他没有能把这个时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爭論問題視为是当时階級斗争的反映;如果說他在这个斗争中只看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善良者和凶恶者以及凶恶者的最后胜利;如果說他对于决定斗争始末

① 这篇序言的第一部分是恩格斯在 1870 年 2 月为《德国农民战争》德文第二版(1870 年在萊比錫出版)所写的。由于准备第三版的出版,恩格斯又在 1874 年 7 月 1 日写了第二部分作为补充。第三版在 1875 年于萊比錫出版。——編者注

的那些社会关系所持的见解包含有很多的缺点，那末这一切都是由于这本书出世的那个时代的缺陷<sup>①</sup>。相反，这本书是德国唯心历史著作中值得嘉奖的一个例外，就当时看来是写得极其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

在我的论述中，我企图以只是大致阐明斗争的历史进程，来说明农民战争的起源，所有参加这一战争的各种党派所采取的立场，这些党派借以企图弄清自己地位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以及作为从当时各阶级所处社会生活历史条件中必然产生的后果的战争结局本身；换句话说，我是企图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和宗教的理论等，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海陆交通、商业和货币流通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一发展程度的结果。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创立的；并且他发表于同一个《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的那些专论 1848—1849 年法国革命的著作，以及他所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也是以这个历史观为立论基础的。

德国 1525 年革命和 1848—1849 年革命间的类似处，是异常显眼的，以致使我当时不能完全不谈到它。但是除了事变进程中的相同点而外，即除了在前后两种场合都是由同一诸侯军队把各种地方起义相继镇压下去之外，除了当时城市资产阶级在这两种场合的行动都是相同得令人可笑之外，其间的差别也是十分明显的：

“从 1525 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诸侯。从 1848 年的革命

<sup>①</sup> 齐美尔曼著的三卷集《伟大农民战争史》第一版是于 1841—1843 年间刊行的。——编者注

中得利的是誰呢？大諸侯，奧地利與普魯士。站在 1525 年的小諸侯背后的，是用捐稅鎖鏈把這些小諸侯束縛起來的小市民，站在 1850 年的大諸侯背后，站在奧地利和普魯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過國債制服了這些大諸侯的現代大資產階級。而站在大資產階級背后的是無產階級。”<sup>①</sup>

很可惜，我不得不指出，我的這個論點是未免把德國資產階級看得太高了。的確，它無論在奧地利或普魯士都是曾有可能“靠國債迅速控制”君主國的。可是，它無論何時何地都沒利用過這個可能。

由於 1866 年戰爭的結果，資產階級獲得了奧地利作為禮物。但是，它不善于統治，它懦弱無力并庸碌無能。它只會做一件事，即當工人們剛一動作起來，它就施行對他們瘋狂的攻擊。它所以還在掌握政柄，僅僅是由于匈牙利人需要這樣作。

而在普魯士呢？固然，國家債務是以驚人的速度增加起來了，財政赤字已成了經常的現象，國家支出一年比一年增多了，資產階級已在議院里占有多數，非經它同意就既不能增加賦稅，也不能訂借債款，——但是，它對國家的統治何在呢？還在幾個月以前，當國家又面臨財政赤字的窘境時，它的地位是極為有利的。它甚至只要稍加堅持，就能迫使國家作很大的讓步。而它是怎樣做法呢？它認為它所取得的足夠的讓步，是政府允許它獻款約九百萬，並且不只是一年，而是此後永遠每年捐獻。

我並不想來苛責那班在議院中坐着的可憐的民族自由黨人。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是曾被那些站在他們背后的人們即資產階

<sup>①</sup> 見本書第 112 頁。——編者注



級大众拋棄了。这个大众不願进行統治。他們还記得 1848 年的教訓。

至于德国資產階級为什么表現得这样畏首畏尾，我們留待下面来讲。

上面引用的論断在其他各方面也完全证实了。我們看見，从 1850 年起，各个小国家日益明确地退到后面去了，只是充当着供普魯士和奥地利进行傾軋陰謀的工具；奥地利和普魯士彼此間发生日趋激烈的爭夺霸权的斗争，以致终于在 1866 年采取了暴力解决的手段，結果是奥地利保留自己原有的省区，普魯士直接或間接地实行統治整个北部地区，而西南部三个国家暂时还被拒于門外。

在这全部演出中，对德国工人階級有意义的只有如下几点：

第一，工人已因普选权的施行而有机会直接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立法議會。

第二，普魯士以吞并三个天定王权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現在，甚至民族主义者也不相信普魯士在这个行动之后还保留有仿佛它先前掌握过的完美无缺的天定王权了。

第三，在德国只存在有一个反对革命的严重敌手——普魯士政府。

第四，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已經應該給自己提出并一劳永逸地解决一个問題：他們究竟是願意作什么人——是作德国人还是作奥地利人呢？究竟是什么對他們更珍貴些——是德国呢，还是雷塔河彼岸的那些非德屬小塊地区呢？早已就很清楚，他們必須二中取一；但是这点一直是被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蒙蔽起来的。

至于从那时起已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和人民党双方热烈討論对象的其他有关 1866 年的重要爭論問題，那末随后数年的历史已充

分证明了，这两种观点如此激烈地互相敌对，也无非是因为它们是同一局限性的两个相反极端而已。

1866年在德国社会关系中几乎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几点资产阶级改革办法——如统一度量衡，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等等，并且都是局限于官僚所圈定的范围内——也还是没有达到其他西欧国家资产阶级早已具备的成就，并且丝毫也没有触犯到主要的祸害——官僚监护制度。而对于无产阶级说来，仅仅那通常的警察实践也已使迁徙自由、公民权、废止身分证等等法律成为完全虚幻的东西了。

比1866年的演出意义更重大得多的，是从1848年起在德国开始加速的工商业、铁路、电报和海洋航运业的发展。尽管这些成就还不及当时英国以至法国所达到的成就，但它们对于德国说来却是空前未有的，而且二十年来比以前整个一世纪内所带来的成果还要多得多。只有到现在，德国才完全和最终被卷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家的资本迅速增加了，因而资产阶级的社会意义也提高了。最能表明工业高涨的投机事业已充分表现出来，它已把各公爵和伯爵系于它的凯旋车上了。在十五年以前，德国铁路还向英国企业请求过援助，现在德国资本——保佑它在天之灵！——则已在俄国和罗马尼亚修筑铁路了。为什么资产阶级还没有在政治上也夺得统治，而却在政府面前表现得如此懦弱呢？

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它按照惯用的德国风度出世得太迟了。它兴隆的时期，正是其他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开始衰败的时期。在英国，资产阶级能把自己真正的代表布莱特引进到政府里去，只是由于扩大了选举权，——这种办法的后果是必定会终结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在法国，资产阶级作为整个阶

級来进行統治，只有两年之久，即只是 1849 和 1850 年間，在共和国时期；它只有把自己的政权让給了路易·波拿巴和軍隊后，才能延长了自己的社会存在。而在欧洲三个最先进国家相互作用已經无限增长的条件，当资产阶级的政治統治在英国和法国已經衰敗了的时候，资产阶级要在德国安安静静确立自己的政治統治，已經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与一切其他先前占統治地位的阶级相比，资产阶级的特点正是在于它的发展中有一个轉折点，經過这个轉折点之后，它的威力手段每进一步的增加，从而首先是它的資本每进一步的增加，只是使它愈益沒有能力进行政治統治。“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工业、商业和交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也就使无产阶级增长到什么程度。而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是到处同时到来，也不一定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它就会开始觉察到，它那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阶级已开始胜过它了。从这时起，它就丧失进行独占政治統治的能力；它在自己周圍寻找同盟者，把自己的統治权分給他們，或是斟酌情况，甚至把統治权完全让給他們。

在德国，对资产阶级說来，这个轉折点在 1848 年就已来到了。誠然，那时德国资产阶级与其說是害怕德国无产阶级，倒不如說是害怕法国无产阶级。1848 年巴黎的六月战斗已向它表明什么前途在等着它；当时德国无产阶级已很义憤填胸，足以向它证明在德国也已撒下可以得到同样收获的种子；从这时起，德国资产阶级政治行动的鋒芒就被摧折了。德国资产阶级已在找寻同盟者，不計价格多少都要把自己卖給他們，然而一直到今天还是沒有絲毫进展。

所有这些同盟者都是本性反动的，这就是具有軍隊和官僚的

王权，这就是大封建贵族，这就是小气的外省容克，这最后就是牧师。资产阶级跟所有这些人们都締結了合同和協議，只求保全自己宝贵的狗命，一直到最后它无可典卖时为止。而无产阶级愈发展，愈开始觉得自己是个阶级，并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来，资产阶级就愈变得畏首畏尾。当普鲁士人极端拙劣的战略在薩多瓦战役中战胜了奥地利人更为拙劣的（这是多么奇怪）战略时，很难說是誰更轻松地吁一口气，是在薩多瓦同样也被击败的普鲁士资产者，还是奥地利的资产者。

我們的大资产者在 1870 年的行动，与 1525 年中产市民的行动一模一样。至于小资产者、手艺人和小店主，他們則將永远是仍旧不变的。他們千方百計地希望挤身于大资产阶级的行列，害怕被推到无产阶级的行列去。他們彷徨于希望和恐惧之間，在斗争时就会力求救全自己贵重的狗命，而在胜利后就一定会投靠胜利者。这就是他們的本性。

无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活动是与 1848 年以后的工业高涨并駕齐驅的。单是目前德国工人在其职工会、合作社組織、政治組織和會議中，在选举以及所謂国会中所起的作用，就足以表明，最近二十年来在德国已完全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德国工人具有极大的荣誉，因为唯有他們才得以把工人和工人代表派到国会中去，而无论是法国工人或英国工人到现在为止都还未能达到这点。

但是，就連无产阶级也沒越出可与 1525 年相比的那种处境。完全和經常靠工資过活的阶级，还远未占德国人民的多数。因此，它也必須有同盟者，而这种同盟者却只能在小资产者、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小农和农业工人中間找到。

关于小资产者，我們已經說过了。他們是极不可靠的，只有在获得胜利时才是例外：这时他們是在啤酒館中高声欢呼，喧嚷不堪的。然而，在他們中間，也有一些自动联合工人的很好的分子。

流氓无产阶级是各阶级堕落分子的糟粕，集中于各大城市，它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班家伙完全是卖身求荣和非常令人讨厌的。如果法国工人們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着 *Mort aux voleurs!* ——杀死盗贼！——并且枪毙了一些，那末这并不是由于他們热中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們正确地認識到首先必須除去这个匪帮。任何一个工人領袖只要利用流氓无产者作为自己的近卫軍或依靠他們，就足以证明他是运动的叛徒了。

小农——富农属于资产阶级——是成分不一致的：

其中有些是封建的农民，他們是还必须为自己的慈悲主人服劳役的。在资产阶级已失掉机会把他們从农奴依附地位解放出来（这曾是它的职责）时，不难令他們信服他們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求得解放。

其中有些是佃农。在这方面，我們这里所有的关系大部分是与爱尔兰相同的。地租已增加得如此之高，以致在得到中等收成时，农民也只能勉强維持本人和自己家庭的生活；在收成不好时，他們因饥寒交迫而濒于死亡，不能交納地租，因而陷于完全听任土地所有者摆布的地位。资产阶级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会为这些人做一点好事。如果他們不指望工人来拯救，还能指望誰呢？

还有一些农民是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經營的。他們大多数是抵押負担如此沉重，以致他們所处的依賴高利貸者的地位，就像佃农依賴土地所有者的地位一样。而他們所剩下的，不过是一些十分菲薄并且由于收成变动而极不稳定的收入。他們絕對不能对資

产阶级寄托什么希望，因为正是资产者、高利贷资本家在剥削他们。但是，他们大部分都很热爱自己的财产，虽然这个财产实际上不是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高利贷者的。尽管如此，也应当说服他们，要他们相信只有在服从人民意志的政府把一切典押债务变成欠给国家的统一债务，从而减低利息之后，他们才能摆脱高利贷者。而这是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实现的。

凡是中等地产和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农业工人就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德国整个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城市工业工人就在这里能找到自己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正像资本家与工业工人相对立一样，土地所有者或大佃户是与农业工人相对立的。那些帮助工业工人的方案，一定也会帮助农业工人。工业工人只有当他们把资产阶级的资本，即为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工具和生活资料变成社会财产，即变成自己的，由他们集体享用的财产时，他们才能解放自己。同样，农业工人，也只有当那首先作为他们主要劳动对象的土地从富豪的农民和——更富豪的——封建主私有范围中夺出来，而变作农业工人合作社集体耕作的社会财产时，他们才能摆脱自己可怕的贫困。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国际巴塞尔大会的著名决议：为了社会的利益，必须把地产变成公共的、国家的财产。这个决议所指的，首先是这样的国家，那里存在有大规模土地所有制以及与其相连接的在大田地上进行的大规模经济，而且在这种大地产上是存在有一个主人和许多雇佣工人的。可是，这种情况一般说来在德国还占优势，因此巴塞尔大会的决议，恰好对于德国是犹如对于英国同样极为适时的。农业无产阶级，即农村雇农，是供给各邦君主军队新兵最多的阶级。这是目前靠普选权而把许多封建主和容克选派到国会去的阶级。

但同时这又是最靠近城市工业工人，与他们处在同样的生活条件，而且甚至处境比他们更贫困的阶级。这个阶级因零星分散而软弱无力；但是，政府和贵族十分知道它的潜在力量，因而故意竭力使学校腐败不堪，让它仍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唤起这个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这就是德国工人最切近和最迫切的任务。一旦农村工人大众学会了解自己切身利益时，在德国就会不能有任何反动的——不论是封建的、官僚的或资产阶级的——政府存在了。

上面那一段文字是四年多以前写成的。它直到现在还有其意义。在萨多瓦战役及德国分裂后是真实的东西，在塞当战役及普鲁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又得到了证实。可见，所谓高级政策“震撼世界的”演出，是很少能使历史运动方向发生什么变化的。

这个演出只能促进这个运动的过程。在这方面，上述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的发动人无意中得到的成果，大概是极不合他们自己的心愿的，但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都不得不注意这些成果。

1866年的战争已经把旧普鲁士根本震动了。在1848年以后，使西部各省骚动的工业成分——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重新遵守旧纪律，已是费了不少力气；这件事终究还是成功了，而且东部各省容克的利益与军队的利益一起，重又在国家中占了统治地位。在1866年，几乎德国整个西北部都成了普鲁士的了。姑且不說普鲁士的天定王权已因吞并其他三个天定王权而遭受了不可挽回的道德损失，——现在帝国的重心已显著地移到西方去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原有的500万人口已大有增加；起先有400万德意志人因受直接兼并归附进来，后来又有600万德意

志人通过北德意志联盟間接兼并归附进来。而在1870年，又增添了800万西南部德意志人，結果在“新帝国”中，跟1450万旧普魯士人（在易北河东部的六个省份里，那里还包括200万波兰人）对立的，是早已超过了旧普魯士容克封建制度的約2500万人。因此，正是普魯士军队的胜利使普魯士国家建筑的整个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动；容克的統治甚至使政府也愈益感到不堪忍受了。但同时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已把容克与资产阶级之間的斗争排挤到后面去，而把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間的斗争提到显要地位上来，所以在旧国家的社会基础中，从内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从1840年起慢慢腐朽了的君主国存在的主要前提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間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是由君主国保持了均势的。但是从問題已經不在于保护贵族免受资产阶级攻击，而在于保卫一切有产阶级免受工人阶级攻击时起，旧有专制君主国就一定要完全轉变成专为此目的而发明的国家形式，即波拿巴主义的君主国。普魯士向波拿巴主义的这一轉变，我在另一篇著作中（《論住宅問題》，第二篇，第26頁及以下）曾研討过。但是在那里我可以不談一个在这里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实，即这个轉变是普魯士在1848年以后向前迈进的最大一步。可見，普魯士是多么落后于现代发展的。它仍然是个半封建的国家，而波拿巴主义無論如何則是以消除封建制度为前提的现代国家形式。所以，普魯士应当决心消灭内部封建制度无数的残余并牺牲容克阶级本身。所有这一切，当然以柔和的形式并在可爱的«Immer langsam voran»<sup>①</sup> 韵調下作出的。譬如，臭名昭彰的州区条例就是这样。它廢除个别容克在他領地范

① 意即“永远循序渐进”。——編者注



園內的封建特权，但这不过是为了用全体大土地所有者在整个州区上的特权这一形式来恢复上述特权。事情的本质依然如故，只是把封建的語言翻成资产阶级的語言而已。旧普魯士容克迫不得已被变为与英国大地主类似的人物，但是他完全无须乎特别反抗这件事，因为两者都是同样愚蠢的。

所以，一个特殊命运降临到了普魯士头上，即于本世紀末，以令人欣慰的波拿巴主义形式，完成在1808至1813年开始了的，并在1848年前进了一步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如果一切都很順利，世界将安静地等待着，我們自己又能长寿的話，那末也許我們到1900年时会亲身看到，普魯士政府确实消灭了一切封建机构，因而普魯士終於达到了法国在1792年时期所处的地位。

消灭封建制度，若用肯定的形式来表示，就是确立资产阶级制度。随着贵族特权的廢除，立法也成为资产阶级的了。在这里，我們可以看到德国资产阶级对待政府的态度基础。我們已知道，政府是被迫实行这些緩慢而微小的改良的。但是，政府在资产阶级面前把每一个这种小让步都描繪成对它所作的牺牲，描繪成費很大力气从国王手中争得的恩惠，而认为资产者自己也应当对政府作某些让步。于是，资产者对真相虽然十分了然，但却自甘去受这种欺騙。由此就产生了在柏林不公开地成为国会和普魯士議院各次討論基础的默契：一方面政府极緩慢地修改法律以利于资产阶级，消除各种封建的和由于划分成小国家而造成的阻撓工业发展的障碍，确立統一的币制和度量衡，确定营业自由等，准許迁徙自由而使德国的劳动力受資本无限支配，保护貿易和投机事业；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使政府保留全部实际政权，批准賦稅、公債和征兵制，并协助它这样来制訂一切新改良法，务使控制那些不称心人